

景觀

哪裏是上海？

——十九世紀上海地圖與城市形象的爭奪戰

• 葉凱蒂

一 上海與其不斷移動的「中心」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上海，是一個由不同政治勢力組合而成的城市。代表兩極的一方是清朝管轄下的上海縣城，另一方是由外國納稅人選舉出的工部局管理下的公共租界。法租界處於兩者之間，雖也有工董局，但實際上是受法國政府管轄。租界是由來自各國、各地方的移民組成的，這些「外來者」以不同的文化、地域與團體，創立了一個既衝突又重疊的多層次的城市文化結構。

作為一個城市，上海不斷改變其形狀，移動其重心。由於城市的不同組成部分和不同利益結構在不斷爭奪其定義權，所以上海的哪一部分能真正代表城市的形象，並最應也最能代表「上海」，遂成為各方爭奪的重點。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上海的未來與城市發展的方向是一個沒有結論的未知數。

異常豐富的上海史料，給圍繞在

上海定義上的抗衡提供了多樣的史據。其中上海歷史地圖對此反映得既具體又生動。在地圖屬實可靠的名義之下，隱藏在其「客觀線條語言」之中的上海形象與形狀，實際上是具有高度自覺性的產物。在地圖的平面上，形狀與內容是用來表明截然不同的觀點的。從上海地圖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上海地圖最重要的目的並不是表現「客觀事實」，而是利用「客觀事實」來製造某一種「事實」、闡述某一種觀點。一張地圖可以被看成是一種敘述，有着清晰的故事結構、角色和宗旨。在對地理形狀的描述中，表達了一定的價值觀和對城市的某一種認識。由於十九世紀的上海地圖強調對城市部分性的「真實」體現，使之成為選擇描述的產物。

二 地圖的文化結構

上海地圖與城市相同，是由很多層次組成的。歸納起來，第一個層次

是地圖上公開表明的製圖目的，例如旅遊觀光圖、導航圖、擴路圖等。這一層的內容，一般在地圖上直接註明。第二個層次是地圖的具體內容。比較不同的地圖，這層意義明顯反映在地圖的圖形中究竟包括了甚麼？排除了甚麼？甚麼被曲解了？尺度的比例如何變化？第三層次是地圖對具體形狀的體現。例如上海是以甚麼形狀出現的？(是甚麼的一部分？獨立於甚麼？)以及城市各個組成部分的尺度和全圖的比例、製圖用的方位與顏色等。從這個角度看，地圖可以說是文化的產物。通過形狀、顏色和符號，上海地圖用其微妙的顛覆性語言對抗着與其觀點不符的其他圖形。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中西雙方如

何在地圖製作上顯示一個地點的重要性，亦有着很不同的歷史^①。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由於商人與探險家為征服世界而遠航，地圖的製作水平與普及程度都很高。與遊記文學不同，通過航道、海岸線、陸地的形狀，地圖成為歐洲人敘述世界的新方式。反觀中國，地圖的發展主要應用於軍事與國防。要表達對一個地方的印象，運用的是文字而非圖形。讀者接觸到的，是由濃厚的文化與歷史敘述營造起來的地方，讀者甚至不需要離家遠行，「心遊」或「臥遊」便可^②。直到十九世紀中期，在西人擴張的壓力下，中國官員才被迫認識到地圖的重要性^③。當西洋人在上海出現的時候，中國官員面對的不僅是兵艦大炮，同時還有西洋人手裏的上海地圖^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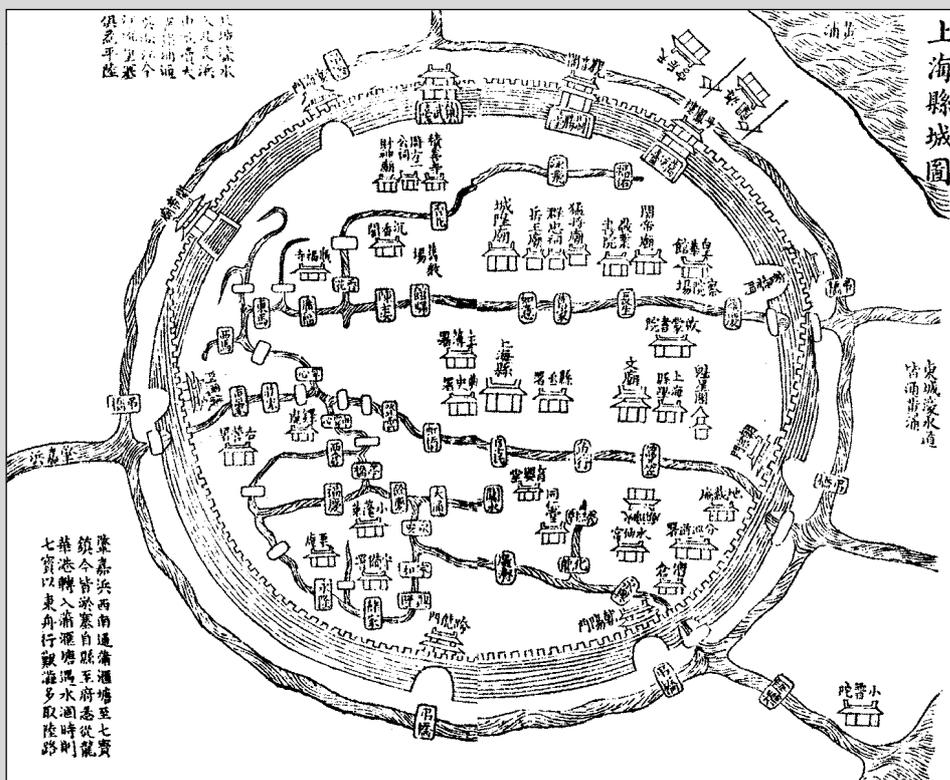


圖1 《嘉慶松江府志》的「上海縣城圖」，製於1817年。

三 早期的上海地圖：不同視角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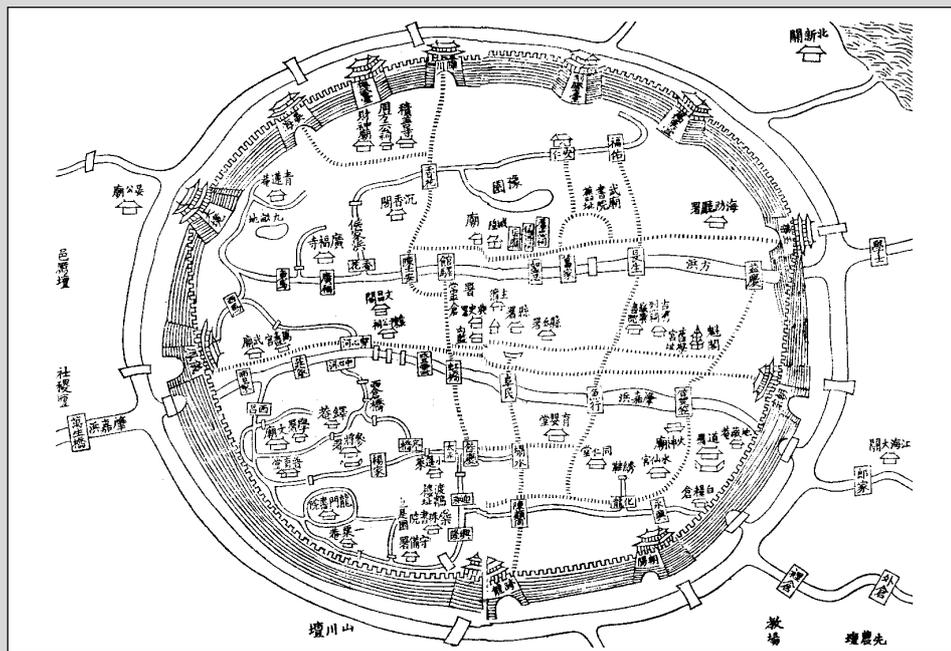
上海早期的地圖，是十八世紀仿製的「古上海鎮隸華亭界圖」，表現的是宋代的上海，那時上海屬鎮^⑤。從另一張十八世紀複製的元代上海地圖可以看到，上海在未建城牆時已經有了城形（上海縣城牆建於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比較後來的上海地圖，可以看出鎮內的大街小巷、廟宇學堂、房屋住宅的基本布局已經定型^⑥。最早的上​​海縣城圖製於1817年，載於《嘉慶松江府志》（圖1）^⑦。圖上增加了城牆和廟宇學堂的位置，城內布局變化很小，最大的變化是北門樓外增加的海關樓。從一幅十九世紀繪製的上海地區水路圖可以看到一幅太平世界、魚米之鄉的景色^⑧。圖中的着色為突出這景色起了重要的作用：黃浦江與水道用的是淡褐色，河上畫着漁船和形象清晰的漁翁，環水而立的上海縣城，城牆以深

藍色勾出，襯托出一種無憂無慮的情調。

就我所見到的西人製圖之中，最早的一幅上海地圖大約製於上海開埠11年之後（參見彩頁四上），亦即1853年^⑨。以這幅1853年的西洋地圖和當時僅有的《嘉慶松江府志》的「上海縣城圖」比較，兩圖突出的差異在於表示城內外重要信息的標誌之上，而分歧的根源在於政治文化意識。佔華圖中心位置的是縣衙門與各類政治管理機構，而西圖的中央「首席位置」則被「倫敦慈善會」的大教堂所佔據。與此同時，西圖不但把縣衙門完全刪去，而且以基督教教堂代替了城內所有的寺廟。值得注意的是，這時西圖繼續把縣城叫作「上海」，而租界則以「場地」（ground）自居。

同治十一年（1872），在上海租界建立30年之後，清末著名學者俞樾新編纂了一部《上海縣志》，其中包括上海縣的局部地圖「上海縣城圖」（圖2）、「上海縣城內外街巷圖（一）」，

圖2 同治年間的「上海縣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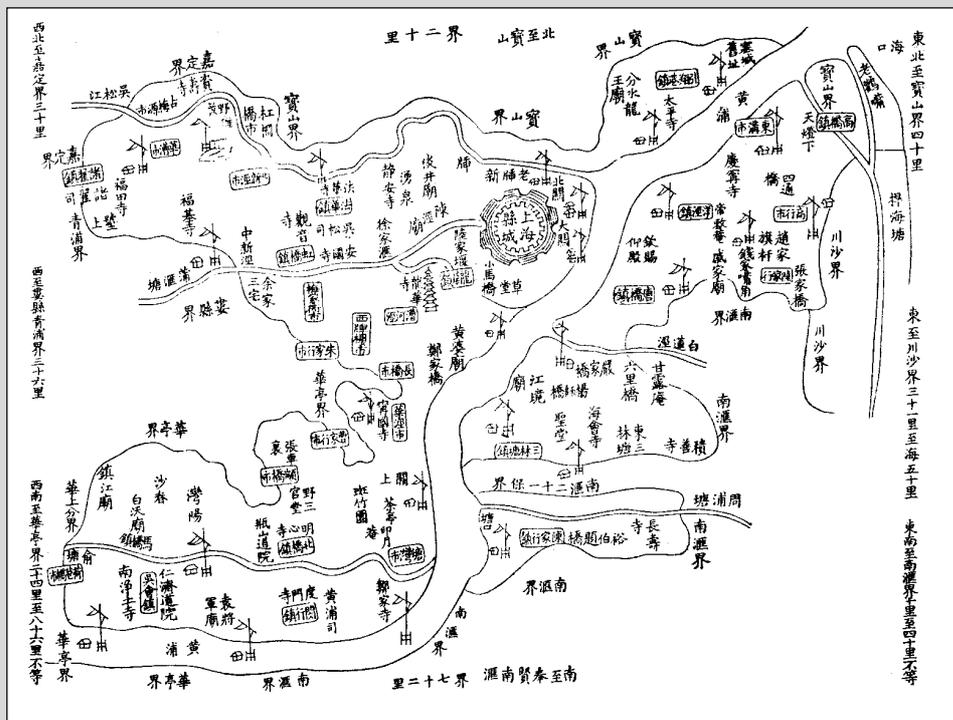


圖3 1872年由俞樾編纂的《上海縣志》，其中刊載了「今上海縣全景圖」。

(二)和「今上海縣全景圖」(圖3)⑩。然而，在縣志詳盡的記載中，卻沒有一條是關於租界的。與文字一致，地圖對上海租界存在的這一事實採取完全否認的態度，緊挨着新老北門的法租界連街名也沒有。租界存在的客觀事實不但沒有文字證據，就連其存在的形狀也便被徹底抹消。出現在「今上海縣全景圖」中的上海，是傳統社會秩序的典範，沒有外國勢力的侵入，也沒有停泊在縣城門外黃浦江上的外國炮艦。由縣志中體現的上海與上海人的生活，沒有任何外國勢力的蹤跡。這組地圖反映出清朝對上海與上海地區出現的新權力關係的被動態度。出於企圖抑制外國勢力及其影響的動機，這些地圖有選擇地無視了客觀現實。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正是這種不肯積極面對事實的態度，導致了後來縣城在與租界競爭之中的失利。

同在這一階段，外國人將鞏固、擴充、控制其在上海獲得新「場地」的願望，直接反映在上海地圖的製作質量與數量上。其中包括英、法、美租界的局部地圖，以及為戰爭、打獵、導航、擴路、測量水位、管理碼頭、市政管理、商務、投資等需要製作的各類地圖⑪。除了出自商務、行政和軍事的明顯需要以外，這些地圖同時又是宣傳的工具，其作用除了在顯示與標榜自己以外，也在爭取認可、削弱抵抗。

比較西圖與華圖，其中一個明顯區別是前者強調「城」與「鄉」的巨大差異。西圖中的租界以標誌城市建築與生活方式為原則。城內標出的是銀行、洋行、郵局、港口、大自鳴鐘、行政機構所在地，示意着商務；城外區域則以出遊打獵為標誌，這反映出西人的理想生活方式。華圖的表現方法幾乎完全相反，除了城牆之外，城

內與城外體現出的生活與經濟方式區別不大，突出的同是廟宇、集市、園林。

逐漸地，在西圖不斷增加而華圖毫無進展的情形下，「上海」這個名稱不再只用於縣城。在西圖中，「上海」開始包括各個租界地域，縣城與租界開始形成一個由不同部分組成的整體。十九世紀60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上海縣城經常被西圖稱為“Chinese City”或“Chinese Town”——「華埠」，與租界位置平行^②。西、華雙方的發展趨勢，是華圖極力否認租界的存在，而西圖則極力擴大其影響，把縣城劃在自己的勢力範疇之內。這反映了中西兩個政治體系與文化的不同策略，以及它們之間的微妙抗衡。因此可以說，上海地圖是一種符號，它暗示着為爭奪掌握城市未來權力的自覺較量。

四 黃浦江的位置：兩個未來上海的競爭

華圖與西圖最有代表性的區別，體現在對黃浦江的位置及形象的表現上。在西圖中，黃浦江是城市描述的中心，這與華圖完全無視黃浦江形成鮮明對比。這個分歧，一開始就可以在地圖中看到。這兩種對黃浦江截然不同的態度，其深層的意義在於它反映了對城市未來的兩種設想。一個明顯的象徵性例子是租界當局權力機構的所在地。從前述1853年的西圖中可以看出，英美領事館都不在租界中心而立於河邊，這位置預示了西人對上海的方向性策略。

「港口碼頭」（“The water front”）是歐洲商業都會及後來工業城市的

重要組成部分與象徵。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被時人稱為一座「徹底信仰賺錢」的城市^③。那時的一幅地圖，將整個城市面向大海（參見彩頁三下）。儘管阿姆斯特丹被三面城牆圍繞，但它已不是中世紀式的堡壘環城。地圖以細緻的手法突出城內房屋建築與街道的位置。以此相比，西人的上海地圖與此圖有重要的、文化上的相同之處：上海的開埠完全是為了通商。作為「為賺錢而建立的」上海租界，黃浦江是其生存的命脈。為了吸引未來的投資者，西圖不但註明上海地區的棉糧產地（例如一幅發表在一本最早的英語上海指南中的1867年地圖），更重要的是強調黃浦江的水運條件^④。

在西圖中，黃浦江普遍地佔據中心位置。1862年一幅名為「上海：城市及郊區」的英製地圖，以超現實的手法浪漫化了黃浦江的形象及其對上海的重要性（彩頁二上）^⑤。黃浦江在這張圖中明顯地佔據着統治地位，它豎立在圖中央，河道從上到下切過圖面，而城市猶如其子依附著大江，就像依附著生命線一樣。這幅把上海縣城包括在其內的地圖，描述了西人對未來上海的展望。同時，大河獨霸天下的形象體現了西人在上海的目的：黃浦江是通商航線，是海運商務的命脈。

相形之下，同治年間的華人上海地圖則沿襲傳統，以廟宇、市集為主要體現上海地區的生活方式（圖1、圖3），而這生活的圖畫又是從正統文化意識形態中演變而來的。地圖體現了傳統以士、農、工、商為界限的社會等級觀念，商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恰由黃浦江在地圖中的地位暗示出

來。在同治圖上，大江於城市而言只佔據地圖右上方不起眼的一角(參見頁74圖2)。黃浦江雖然象徵着商業運輸與商人的利益，但在表現黃浦江的地圖中(參見頁75圖3)，大江的重要性也被其周圍的市井鄉村所淡化。在土地與江河、農業與商業的社會關係中，雖然大江在上海人的生活中佔有很重的分量，但《上海縣志》圖卻可以完全無視這事實。它所表現的是一個理想的社會關係。在城內，文明的象徵是由官方行政機構與士大夫傳統的文化古迹園亭來表現；在城外，則以農業與漁業為代表。至於與商務聯繫的黃浦江，儘管作為南北的交通樞紐、上海縣重要的經濟來源，可是在地圖上卻完全沒有地位。《上海縣志》地圖與西洋地圖同樣是文化觀念的產物，無法代表事實的整體。由於華人地圖無法表示自己的經濟潛力，因此也無法與在上海日益強大的西方經濟與政治勢力下產生的西圖競爭。從任何一種經濟角度看，《上海縣志》地圖都不可能與西圖相比。

對黃浦江的表現，反映了西人與華人對上海的憧憬。西圖表明西人決心將最大限度地利用河運發展擴大通商，從而使上海成為西商打入中國內地市場的據點。華圖與其相反，表現力爭保持傳統社會秩序的意志。在西方衝擊東方傳統社會的十九世紀末，華圖所表現的這種傾向，代表傳統觀念此時的被動性。

五 城市空間

西圖與華圖的差異，突出了地圖潛在的政治與文化取向，也進一步反

映出製圖在決定地理空間的內涵時所發揮的文化等級觀念的作用。上海地圖充分顯示了這一點。同是一個地理位置，卻顯示出兩個不同的地方：一個是通商港口，另一個是魚米之鄉。從這兩種世界觀對地理的解釋差異中，可看出文化觀念與思想意識在表現一個城市的形狀與內涵時，確實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其中反映着不同文化對城市的定義以及城市代表甚麼的不同認識。

在一幅1855年的英租界全圖中(參見封底，其中稱上海縣城為“City of Shanghai”)，清晰地畫出租界內的每一幢房屋及其形狀，並附以數字為代號^⑥。此圖具體地顯示出城市布局、內在組成部分、樓房建築與街道之間的結構關係。同時為了強調上海的商務，圖中還附有工商行號索引。在圖的上端，更標示了外灘的重要洋行及租界的行政機構，甚至進一步以近觀的角度突出岸邊雄偉的大廈形象，以烘托出上海國際金融商務的實力。熟悉上海的人很容易從這幅圖上各式洋房的形狀中辨認出上海最有實力的洋行。圖中除了突出英租界的生活與工作環境的平安有序、商務興隆之外，還以抒情的手法強調上海的優美恬靜。這一點與當時的一些華圖十分相似，特別是華製的十九世紀上海水路圖，表現的同是船隻、綠水青山，一片和平景致。但比較二圖，其本質上的區別仍相當明顯：西圖顯示租界城區的面積，其地理的重要性，以及其有條理的城市發展規劃，以此突出帝國的風度和商業實力；華圖中的上海由厚厚的城牆圍起，對牆外的黃浦江表現出一種防禦姿態。相比

之下，黃浦江成為西人表現自己力量的標誌，外灘成為顯示其成就的舞台。

六 華文上海商務地圖： 城市的新形狀

1850年至1870年間製作的早期上海地圖，基本上代表中西官方的觀點，所有地圖幾乎都是為官方用途而製作的。這體現出一種政治文化，那便是各政權只對其管轄的地區負責；其結果是，上海地圖中的形狀與內涵又是由各個政權所代表的執政範圍決定的。我們可以從後來的上海商業繪製地圖中看出，這些地圖其實影響與牽制着上海的未來。

在上海縣城與租界的勢力懸殊的相對關係中，力量重心漸漸倒向租界一邊。租界內的華商生意興隆、勢力越來越大，他們對上海的態度與立場，開始反映在地圖的製作與內容上。1875年，租界華人馮卓儒和許雨蒼製作了一幅名為「上海縣城廂租界全圖」的地圖（參見彩頁四下左）^⑩。此圖為上海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形狀，這是華圖中第一張既包括縣城又包括各租界的上海全圖。此圖由後來清朝駐德國大使李鳳苞作序，從序文可以看出，地圖的重要性已得到當時有志於政治改革的文人與官僚的重視。馮、許圖實際上是對1872年《上海縣志》圖的一個回答，李鳳苞在序中也暗中批評了俞樾，他指出：如今「上海為通商要口，中外雜處，轂擊肩摩，公私共聚，尤以地圖為要」，並強調上海的紳商官僚均極其需要可靠的上海地圖。

馮、許圖更採用了技術高超的科學製圖法，為「官商士庶索」^⑩。

馮、許二人圖標誌着上海地圖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此圖把上海表現為一個整體，打破了傳統華圖的禁區，這體現了華人对上海的新認識。此圖第一次向廣大讀者介紹上海各國租界的形狀與內容，使華人第一次看到華界與租界的地理關係。馮、許二人在對黃浦江圖的處理上，亦與華圖傳統決裂。以西洋製圖的「指北法」為製圖原則，黃浦江由上到下豎立在圖中，佔據着上海地形的統治地位。從對黃浦江的表現可以看出，華人對上海的解釋開始向西人靠攏，華商的勢力在租界日益壯大，以黃浦江為代表的開放通商精神開始被租界華人接受。此圖在形式上雖多方採納西洋模式，但在內容上卻做出了重大的突破與貢獻，圖中對租界內的大小街道無論重要與否都有標誌，其中包括西圖一貫不註的租界內里弄地名。里弄是華人在租界生活經商的所在地，以里弄為製圖重心，強調了華人的生活方式與營業方法。同時，這個重大突破也表現在大街的署名上。儘管上海租界內許多主要街道都是由英人以中國城市來命名的，但地圖上標出的卻是華人在生活中對這些街道的稱呼。例如西人稱「南京路」，華圖稱為「大馬路」；「福州路」則稱為「四馬路」。以正名為出發點，華圖表明華人是租界經濟與文化的一個強大組成部分，並以街名和里弄地名具體表示其佔有的位置。

比起同時期的西圖，馮、許圖重視的是街道而非建築。城市的空間由街名體現，而不是以形狀或顏色來代

表。用華人地名表現上海租界，實際上是一種對城市空間的佔有，也是使租界華人化的體現。

馮、許圖積極表現華人利益，給城市帶來新的解釋。至於馮、許圖的具體印數多少、散布如何均無記載，因此很難斷定其影響範圍。但從後來英人美查 (Ernest Major, 1841-1909) 以此圖為模式，用石印的技術大量印刷增新版這一事上，可以斷定此圖在當時的地位與歷史價值。

十九世紀70年代中期，出現在上海租界內的新式華圖中，影響最大的可能是1876年葛元煦編著的《滬游雜記》中的租界圖^⑩。此書是第一部由居住在上海的華人撰寫的租界指南，出版後立刻成為當時的「暢銷書」，一直持續了幾十年不斷再版^⑪。書中的地圖不再是官方的產物，而是以商品面目出現在書市上。此圖以英、法、美各租界的局部圖組成 (圖4) ^⑫。儘管以

西圖為模式，這些地圖已不是西圖。除了取西圖的地形為標準之外，其內容完全反映了華人的視角，這點與馮、許圖相同。葛圖的出版雖晚於馮、許圖一年，但由於葛圖形狀小，且與指南一齊出版便利讀者，加上在十年間不斷再版，產生的影響較大。

十九世紀70年代的上海租界華人地圖，反映了在租界居住的華人對租界、對自己在租界的地位與社會角色變化的認識。與1872年的同治《上海縣志》圖相比，「上海縣城廂租界全圖」和葛圖都表徵着華人對西方挑戰的一種回應。在時間上，這些地圖的出現與租界華商及文人人數的增加、其社會與經濟地位日益顯著屬同一時期。華圖中展現的上海新形狀，反映了華人集體自信心的日益增強。雖然這些地圖仍帶有政治色彩，但總的說來，是從商務的角度來描述上海的。其重點在於突出商業，為華人商行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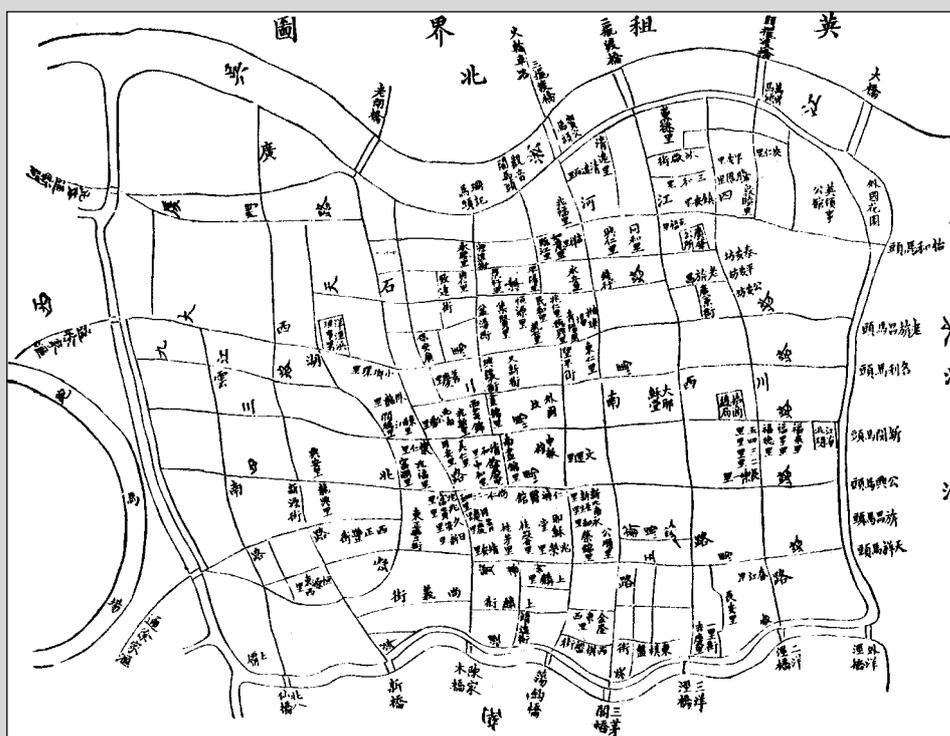


圖4 葛元煦《滬游雜記》中的「英租界圖」。

使其買賣場所為人所知，等等。從當時的商務行號簿、工部局年終報告、中文報紙《申報》的創立以及《申報》以華人讀者為中心的新聞、廣告中可以看出，租界在1870年代已成為西商和華商共同做生意的地方，這也可以從時人的日記中得到印證²²。

七 申報館與上海未來的新形象

把外國租界劃為上海不可否認的一部分，根本上改變了上海的形狀，可稱為一場視覺革命。但是，把這重大的觀念性轉變推廣普及到全國，卻是上海申報館的創辦人美查的貢獻²³。自1879年，美查開始利用點石印刷術，以商品的形式大量印刷出版地圖。1880年他出版了屬於他的第一張上海地圖，後又於1884年由他新創立的點石齋複印（參見頁四下右）²⁴。通過地圖及其他視覺文化出版物，美查對當時正處於雛型狀態的上海市民文化意識進行了開發。美查的上海地圖是以1875年的馮、許圖為基礎的。他在圖中的序言中指出，由於馮、許圖已出版一段時間，加上圖中租界路名里弄地點上的失誤，故有必要特製新版。這幅點石齋上海地圖，可以說是中西文化觀念、製圖傳統結合的產物。作為英國人的美查，使一幅已經十分洋化的華製上海地圖變得更可靠、更普及，他的地圖示意了1880年代華人團體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上海租界得到積極地肯定。點石齋圖線條清

晰、製圖精緻，既講究科學又富有美感。在當時，這幅地圖無論在質量與藝術創新上都是最好的了。圖內更突出細緻地表現了上海縣城與租界內的各個重要商行與政府機構，無論國籍所屬。其圖形仍以馮、許圖為準，保留了上海縣城在圖中的中央位置，並且按原圖用比租界大的字體來表現上海道台府。地圖立場明確：在這中西結合的空間，華人佔主導位置。

當然，租界華人對上海以及上海多民族重疊文化的認同，決不是美查創造出來的。美查的貢獻在於他能洞察這個傾向，通過先進的印刷技術給以表達傳播的機會。忠實於上海的商業精神，美查不但對中國文化風格、風趣、風味有極敏銳的理解，而且懂得其市場潛力。從1880-1890年代的《申報》廣告中，我們知道美查把印刷出版地圖當作一項頭等重要的業務。這些地圖的質量非常高，有些價錢亦不便宜²⁵，有些地圖更直接與報紙同發²⁶。

美查本可以以英圖為模式來繪製上海地圖，但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清楚知道，一幅地圖無論多麼地科學，歸根結柢不過是具有高度文化和政治敏感性的產物。這點可以從點石齋1884年圖和達爾文特 (C. E. Darwent) 1903年的上海指南圖（參見封三上）的對比上看得更清楚。英人圖指示出所有重要的洋行地點，點石齋圖對華商洋商一視同仁，並着重註明西圖中沒有的華商經營所在地里弄地名²⁷。由於《申報》是中文報紙，美查的市場是華人。美查扮演的角色，是

多民族文化交流領域裏的先行者²⁸。從長遠的觀點看，這種文化交織是租界能夠發展成為世界大都會的重要因素。

八 商務原則的全盛期

十九世紀末的上海，是一個有着內在反差比較的城市。由於以商務為宗旨的租界地位日趨重要，上海的形象也開始以此為代表。同時，上海各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開始發生變化。面對以賺錢為準則的租界在經濟上的成功，上海縣城採取了更加保守的立場。1918年的《上海縣續志》圖志，第一次包括了一張十九世紀末繪製的租界圖，但此圖的簡陋程度驚人。這張名為「租界略圖」的地圖²⁹，完全無法反映當時租界的經濟實力與人口數量。1910年代，上海地區的一半人口

(130萬人)居住在租界³⁰。在這之前，西圖已把縣城完全刪除，或把縣城完全納入租界內。到了二十世紀，西圖普遍以「本地人之城」(Native City)來稱呼上海縣城。上海縣城也由中心位置移到地圖的下端。在這時期，租界不斷擴張，使上海縣城在形狀上不斷縮小，幾乎有被「吞併」的趨勢。在一張1919年由公共租界工部局製作的上海地圖上，縣城的形狀是一個完全無意義的空白(參見封三下)³¹。1930年代出版的英語《上海指南》(City Directory of Shanghai)刊載了一張名為「上海地圖」的地圖³²，但有趣的是，上海縣城卻被劃在其外。1933年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發表的上海地圖，縣城已完全被租界淹沒，圖中縣城原有的中心位置被跑馬場代替。一張由1933年的中文《上海指南》發表的地圖，儘管把上海縣城包括在上海大都會的布局之中，但卻以紅線勾出，像



圖5 載於《上海市行號路圖錄》的福州路地圖，最能表現上海的商業性格。

塊異邦屬地，孤立於圖形整體之內。對上海作為商業城市最有代表性的描述，是1939年出版的《上海市行號路圖錄》。在此圖冊中，上海完全是個商業市場。圖中包括上海各個商行名稱、其街道位置、其房舍所處的商業環境，甚至連商人的姓名也包含其中（參見頁85圖5）^⑳！

在不同的上海地圖中，反映出的是作為通商港口的租界戰勝上海縣城的過程，但這並不是一場種族的競爭。西方雖然以軍事力量打開了通商局面，但中西雙方的主要分歧是政治與思想意識方面的。歸根結柢，促使租界成功與繁榮的重要因素，是華人自願地移民到租界，並讓其發展起來。上海租界的創立實得益於其多民族性。以具體的形式保存在地圖無聲的線條與形狀之中的，便是這場不同

價值觀的交換與衝突的記錄。由於這些地圖後來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場上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並保存了當時上海人以為甚麼是重要和必要的，甚麼是不代表他們的。具有歷史諷刺性的是，當國民政府在1927年接管上海華界之後，為實現孫中山「大上海計劃」而製作的地圖，竟是一幅完全西化的圖形（圖6）^㉑。計劃中的大上海市中心是由天主教會的十字架組成的。實際上在二次大戰前夕，這個新市中心已經建成，不少政府機構已開始在那裏辦公^㉒。在與中國傳統文化歷史的決裂上，這個「大上海計劃」的製圖，要比租界多民族的文化結構極端得多。

上海地圖的數量、種類以及內涵的價值觀，證明地圖在敘述政治與文化分歧上的潛力。上海地圖記錄了上海在十九世紀中期起步時的變遷，也表現了爭奪城市定義權的過程。從上海

縣城以城牆、廟宇、學堂來表現城市的世界觀，到以黃浦江和商務作為租界自身的定義，上海地圖為這場競爭一一作了記錄。其結果並不能簡單地說是某一種世界觀的勝利，而是各種權力結構的規範性觀念與上海人具體生活態度之間不斷協商的過程。在上海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和地圖，當然與走在大街上的人們的行為不同。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上海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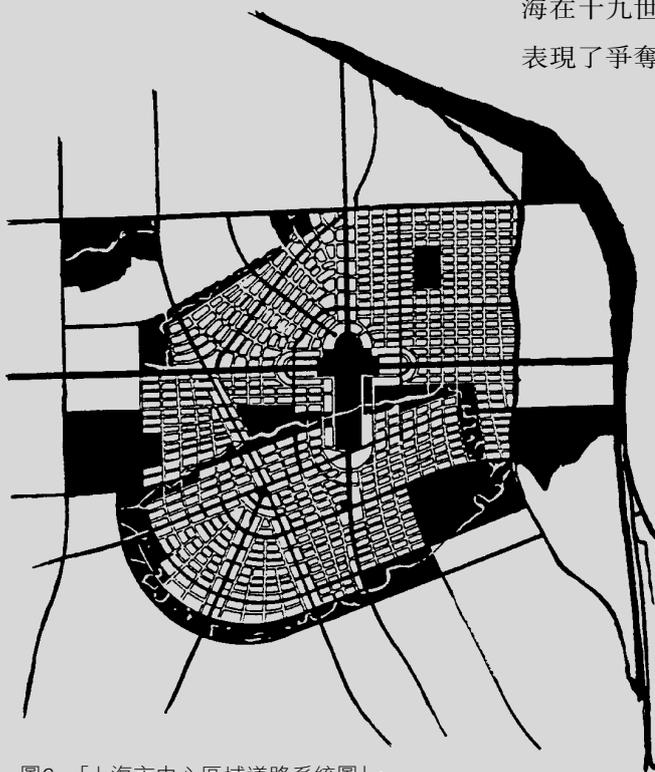


圖6：「上海市中心區域道路系統圖」。

圖卻反映了人們的心態，並促成了人們在一定歷史時期對上海社會中價值取向的共識。

正如莫門尼亞 (Mark Monmonier) 在《如何用地圖來撒謊》(*How to Lie with Maps*) 一書中指出，選擇性地表現是地圖的特性：「一張地圖，只是其他無數張可能在同一情況用同一數據製作的地圖中的一張。」^⑥上海作為一個案例，充分顯示出地圖的地理政治性和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文化觀念。如何在一張地圖中反映一個社會的狀況？甚麼是「城市空間」與「鄉村環境」的區別？一張地圖應當強調甚麼？而所強調的又如何反映人們真實的生活？——對這些問題的回答，無一不受到文化與政治的約束。然而，上海地圖也告訴我們，作為一個整體，城市如何超越取勝於某一個群體或某一種利益。其多層次的文化結構、縣城與租界不同的進取方向，正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上海發展成為一座現代大都會的基礎。

註釋

① 關於中國製圖史，請參見王庸：《中國地圖史綱》(北京：三聯書店，1958)；盧良志：《中國地圖學史》(北京：測繪出版社，1984)；Cordell Lee, *Cartography in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② 《揚州畫舫錄》便是一例，請參閱袁枚「序」，載於李斗：《揚州畫舫

錄》(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頁4。

③ 請參閱譚兆璋：〈從小乾坤看大世界：古地圖收藏的啟示〉，《明報月刊》，1996年第11期，頁8。

④ C. 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Shanghai* (Shanghai: The Shanghai Mercury, 1909).

⑤ 此圖出自褚華：〈滬城備考〉，《上海掌故叢書》，第一卷(上海：上海通社出版，1935)；另一張十八世紀複製的元代上海地圖，可以看到仍沒有建城牆時的上海已經有了城形。

⑥ 見「上海未築城古迹圖」，同上。

⑦ 「上海縣城圖」(1817)，出自《嘉慶松江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書店，1991)，頁49。

⑧ 此圖無名，內容為十九世紀上海水道圖，為大英圖書館收藏。

⑨ 此圖名為“Shanghai and Its Suburbs. About 1853”，出自 *All About Shanghai: A Standard Guidebook*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海軍已有上海水路圖，這些地圖一般是以中國地圖為根據的。

⑩ 參見俞樾編：《上海縣志》(據清同治十一年刊本〔1872〕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⑪ 以上提及的地圖，筆者見於大英圖書館、紐約市立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上海博物館、上海檔案館等。

⑫⑬ 此圖出自 *The Treaty Port of China and Japan: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Open Port of those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Peking, For Travellers, Merchants, and Residents in General* (London: Mayers, Dennys and Kind, 1867)。

⑭ Mark Girouard, *Cities and Peopl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61.

⑮ 此圖名為“China, City and Environs of Shanghai” (1862)，由大英圖書館收藏。

⑯ 此圖名為“Foreign Settlement at Shanghai: North of the Yang Kang Pang Canal” (1855)，由上海檔案館收藏。

⑰ 此圖名為「上海縣城廂租界全圖」，製於1875年，1x2m，版印，彩色；為大英圖書館收藏。

⑱ 李鳳苞：「圖序」，見「上海縣城廂租界全圖」圖面。

⑲ 葛元煦：《滬游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⑳ 參見鄭祖安：「題記」，參見註㉑書，頁5。

㉑ 均載於註㉑書。

㉒ 從清末日記中可以看出租界在70年代已逐漸在金融、出版、娛樂等方面成為上海的經濟中心，並吸引了大批華商。詳見上海史料叢刊社編：《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㉓ 對美查及其出版事業的資料，見Rudolf G. Wagner, “The Role of the Foreign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 *The China Quarterly* 6 (1995): 421-43。

㉔ 此圖名為「上海縣城廂租界全圖」，石印，1880年第一版，1884年再版，由大英圖書館收藏；1901年此圖曾由日本出版社上海漢讀樓書莊更新再版。見高橋孝助編：《上海史》（東京：東方書店，1995）。

㉕ 點石齋製印的地圖目錄複印在其訂書廣告上。詳見《點石齋畫報》甲4（光緒十年五月，下）「中外地圖」一欄內共列16圖。

㉖ 這一組「皇朝直省地輿圖」有十幾幅之多，以插頁形式發表在《點石齋畫報》中，時間長達幾個月。插頁的用意是讓讀者抽出地圖，最後和《點石齋畫報》提供的封面、美查為此作的前言、目錄表等，一同裝訂成一部完整的中國地圖冊。詳見《點石齋畫報》丁，頁1。可惜在《點石齋畫

報》的複印本中沒有重印這些地圖。這裏引用的資料由瓦格納(Rudolf G. Wagner)提供，在此表示感謝。

㉗ 此圖名為“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t Shanghai”，出自C. E. Darwent, *Shanghai: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To the Chief Objects of Interest In and Around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04)。

㉘ 關於美查在上海文化領域裏扮演的中間人角色，詳見註㉙Rudolf G. Wagner。

㉙ 「租界略圖」出處見《上海縣續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

㉚ 詳見鄒依人：《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90、140。

㉛ 此圖名為“Plan of Shanghai”，由紐約市立圖書館收藏。

㉜ “Map of Shanghai”，由紐約市立圖書館收藏。

㉝ 此圖名為「福州路」，載於《上海市行號路圖錄》（上海，1936）。

㉞ 此圖名為「上海市中心區域道路系統圖」，出自章明：《上海近代建築史稿》（上海：三聯書店，1990），頁16。

㉟ 見孫中山：〈實業計劃〉，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訂：《國父全集》，第一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8），頁517、529-34；有關孫中山的「大上海計劃」，詳見鄭祖安：〈國民黨政府「大上海計劃」始末〉，《上海史研究》，1984年第1期，頁208-28。

㊱ Mark Monmonier, *How to Lie with Maps*, 2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2.

葉凱蒂 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任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研究員兼講師。